

杨沫之名与《青春之歌》紧密相连，对其人或誉或毁，皆与此作品有关。《青春之歌》命运多舛，浮浮沉沉，或消或息，至于今天，这部作品的命运甚至比这部作品本身更有意思，透析这部作品的沉浮或更可理解文学，更可了解时代的变迁。

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反响不一。杨沫在日记中密切关注着《青春之歌》出版之后的各方反应与动态情况。誉之者有之，她记录道：“近日接到了读者的一些信及报上《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党中央宣传部出的《宣传动态》等都载有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或介绍，一般都是好的。”（1958年3月18日日记）又说，“海默写信给我说：周扬同志在最近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1958年4月23日日记）这两条日记，一说主流媒体（包括宣传部的《宣传动态》）评价较好，一说周扬评价较好。杨沫又说“《青春之歌》普及本已出来，印了30万册。昨天回家又见到了一种一元二角钱的本子，印了10万册。总计《青》书已出了71万册了。数量不少，还经常接到读者的赞扬信。”（1958年8月20日日记）这条日记则说书印数很多，大众反映较好。

非议者亦有之。工人郭开批评《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过分浓厚，引发了讨论。杨沫对此亦密切关注，她记录道：“从一月份起北京电子管厂的郭开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后，近一个多月来，《文艺报》和《中国青年》都展开了对《青》书的评论和讨论，热闹得很！许多人都不同意郭开的意见。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1959年2月28日日记）在一次讨论会之后，杨沫又记录道，“郭开开始表现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又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他说写那篇批评《青春之歌》的起因，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有些老工人对《青春之歌》里许多地方谈恋爱，尤其对林道静和几个男人谈过爱情不满，提了些意见。那个与会记者过了几天就给他打来电话，叫他把老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写成文章，给予发表。郭开说他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不知怎么写。可是那位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老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一定叫他写，而且可以帮助他写……于是有了那篇批判文章的出现。”（1959年1月29日日记）

虽然，茅盾、何其芳等著文评论，一锤定音，充分肯定了《青春之歌》，但杨沫依然心有余悸，她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人非叫他写这样的文章呢？他说的又似乎是真话。我不安的思索起来。”最终，杨沫采纳了郭开的许多意见，对《青春之歌》作了修改，1959年再度出版。杨沫说：“修改本和出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所发现的缺点和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改变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杨沫《再版后记》）

这是《青春之歌》出版之后的第一次波折，期间虽有批判之声，但以褒扬为主。

虽然杨沫修改了《青春之歌》，力图使林道静的转变更为合情合理。但是，事情又起了变化。几年之后，郭开再度开火，又出来批判杨沫。“文革”爆发，郭开成了有名的造反派，他于1967年4月15日在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上发表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并在北京电子管厂召开17万人的批判大会，蒋南翔、陆平都被拉上台批斗。“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是著名作家浩然，他心地善良，不肯伤害同志，为

作品被很多人模仿。《青春之歌》所批判的胡适，在20世纪90年代亦逐渐大红大紫起来。甚至杨沫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作《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等，力挺刘亚光，亦是她根据时代变化所做出的再度调整，可惜她所选中的人是错的，其能量错用，落了个没趣，形象亦受到损害。

《青春之歌》之所以浮沉如此，乃由于其内容。《青春之歌》虽然写得很长，人物很多，修改之后叙述很圆满，但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关于抉择的书。首先是杨沫本人的抉择，也是彼时许多人的抉择，亦是国家的抉择，所以该书刚出版时能够引起共鸣。所以，很多年之后，一些人对于当年他们的抉择已经

思想的震撼，对于共产党逐渐心向往之。《青春之歌》续写了《娜拉》，林道静延长了娜拉的故事。早期的林道静是胡适的信徒，之后则成了“马克思的大徒弟相应，她读的书也发生了变化，改读左翼的《铁流》《毁灭》《母亲》等。”（1950年代，胡适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到了广泛批判，杨沫或为避时讳，故不说曾受到过胡适的影响，胡适在《青春之歌》中几次被谈及或直接出场，也都是被丑化）林道静早期的爱人是余永泽，他是胡适的信徒，林道静喜欢他，亦因有较为共同的思想基础，之后的爱人则是卢嘉川们，他们是共产党员，这是林道静心向往之的对象。林道静终于告别了余永泽，迎来了卢嘉川。行前，林道静给余永泽留信道，“永泽：我走了。不再回来了。你要保重！要把心胸放宽！祝你幸福。”这是她的第二次出走，第一次是反抗包办婚姻，表现在反抗家庭；第二次出走是为了革命，还是表现于反抗家庭。《娜拉》是一个“五四”时期的文本，《青春之歌》则是一个深具共产党精神的文本。

《青春之歌》的双重抉择，可称为“革命+恋爱”模式。对青年而言，革命与恋爱最让人向往，最可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五四”时期，皇帝虽已被革命，但依然天下大乱。先贤以为乃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故须进行“新文化运动”，据说当时恋爱就是革命，恋爱就是反抗封建道德、制度，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于是自由恋爱蜂起，社会风气巨变。抗战之前，中国革命的内涵就有了新的变化，就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指向，故林道静抛弃旧我，放弃旧的爱人，更新自己，参与革命，选择了新的爱人。

“五四”之后，围绕如何救中国，确有很多不同的思路。但大略言之，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思路，有“两个中国之命运”。历史和实践证明，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解决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这条路吸引了全国人民，自然包括知识分子。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甘愿转向左翼，盖有由也。可参见齐邦媛《巨流河》对闻一多的描写，齐虽对闻一多持批评和嘲讽态度，但通过其描写依然可以见出闻一多为何一步转到了左翼。《青春之歌》写的就是知识分子心态和立场的转变，这里面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也代表了实实在在的能量。今日，诸多批评《青春之歌》，因未设身处地思索此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曾经不言自明，所以《青春之歌》甫一发表，当时的青年读之热血沸腾，心向往之。今天，由于“告别革命”之声渐起，这些问题都受到了质疑。所以，《青春之歌》再度被批评。

杨沫一直紧跟时代，《青春之歌》应时而做，力挺刘亚光，作《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及续篇亦是应时。其人生热热闹闹，曾风光无限，但亦曾身陷是非之中。之后，杨沫虽然又写出《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但不复有当年轰动，逐渐归于湮没。《青春之歌》沉浮如此之久，有如此“曲折”的命运，盖因此书确实触碰到了真实的能量，成为了时代变化的反应器。透过此书之沉浮，既可了解60多年来文学趣味的变化，也可以了解60多年来的精神变迁和风气转变，更可将其当作一面镜子，照照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时也，命也，令人慨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 谁主沉浮？

——《青春之歌》的命运 □刘涛

杨沫开脱。郭开竟找上门去，揪浩然的脖领子，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是政治广场上的风云人物。”（参见静庐闲人的博文《此郭开即彼郭开》，此文考证了《西藏之水救中国》中的民间水利专家郭开即是批判杨沫的郭开）关于这段历史，杨沫亦说：“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200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的最重的‘大毒草’之一。”（杨沫《新版后记》）杨沫这一阶段的处境和遭遇，老鬼在《血色黄昏》当中也提及。老鬼趁内蒙插队，被打成反革命，一度身陷囹圄，而杨沫自身难保，故亦一度爱莫能助。

这是第二次波折，杨沫被“打倒”，《青春之歌》被当作“大毒草”。

然而，《青春之歌》的浮沉依然没有结束。20世纪70年代末，杨沫平反，出来工作，曾任全国人大常委。1977年，《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推出新版，情况似乎有所好转，《青春之歌》翻身，评价上升，由“大毒草”又变成了香草。

但世易时移，当前对此书的评价却较低，非议之声也较大。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此书竟置之不理，一字不提。年轻一代作家，对此书嗤之以鼻（今年5月，我赴长沙开会，和几位同龄作家聊天，有人谈及《青春之歌》，不屑之态跃然）。某些评论家也对本书评价较低，屡屡批评杨沫趋时附势。《青春之歌》中的正面人物在今天被嘲笑；反面人物却变成了正面人物。“余永泽”在1980年代成为新的“时代英雄”，譬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即受到推崇，不问政治、专心科研、只专不红的陈景润成为新时期的“新人”。余永泽的原型人物，一度被嘲讽、非议，现在却成为了高人、逸士，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他的

隔膜，故鲜再有共鸣。

杨沫的经历虽然相对复杂，但思想相对清晰，《青春之歌》就是其经历和思想的共同反映。杨沫出生于1914年，是中产之家的女儿。初中时，她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做法，甚至可以说，早年的杨沫就是五四的产儿。这些都投射到了林道静身上，只是她将林道静设计为虽长在资产阶级之家，但却是农民的女儿，她和她的妈妈都是被侮辱与损害的。面对包办婚姻，杨沫自述“我当时已读了不少‘五四’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尤其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对我影响更深。”《隔绝》是一部表现反抗包办婚姻的小说，其中有一句宣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死宁”。人们要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对青年人确实有着激励作用。《青春之歌》的前半部分就是《隔离》的翻版，其实也是《娜拉》《终身大事》等小说的翻版。林道静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追求个人自由离家出走，碰到了余永泽，二人相恋。这个故事若发表在“五四”时期，或亦可轰动一时。

娜拉走后怎么办？各人有各人的答案。各个时代也会有不同的答案，譬如今天有人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她怎么可能会出走呢？《青春之歌》相对复杂一些，小说前半部分是“娜拉出走”的故事，后面则有了新变化，“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娜拉走后再度出走，娜拉抉择之后再度抉择。

《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为主角，写了她的成长，写了她成长路上的双重抉择，思想抉择和对爱人的抉择，二者密切相关。小说将林道静抉择的关键时刻安排在新年，这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林道静受到流亡学生的感染，尤其是受到了卢嘉川

## 有关林道静身份的言说史

□李思清

在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本是与爷爷相依为命的贫苦农家庭女，“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林伯唐不仅是湖南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还是“颇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又兼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林道静生在这样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承袭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身份”。母亲的卑微出身又使林道静的阶级身份呈现出令人同情的双重性。她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她的“资产阶级”身份由此而降格，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林道静的“阶级情况”确很复杂。她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她虽是地主资本家的女儿，但她母亲却是受地主阶级戕害凌辱的穷苦村姑。因此，林道静在身份上与“资”、“小资”及“知识分子”均有血缘、亲缘或精神层面的紧密关联，但细究起来，她永远处于三者之间的模糊地带。正因如此，《青春之歌》可以被约定俗成、笼统囫囵地纳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成长史”的范畴来讨论。可是，视林道静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林道静的道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这一系列的“革命言说史”何以形成？

1958年初版的《青春之歌》“内容说明”中，同时出现了两组概念，一是“青年爱国学生”：这部小说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的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二是“知识分子”：小说刻画了当时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和成长的知识分子……也描写了一部分人的动摇和沉沦。这个“内容说明”中并没有出现“小资产阶级”这个字眼。王世德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1958年4月17日）一文，较早将林道静纳入“知识分子”与“革命道路”的二元框架内来讨论。事实上杨沫本人也是这样想的：“那本可怜的书（《青春之歌》）可以见世面了么？人们看了，将如何评论它？会不会批它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批它丑化了共产党员？”（1956年12月15日杨沫日记）导演崔嵬在《电影〈青春之歌〉创作中的几点体会》也指出林道静的故事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个人命运和大众命运联结起来才有出路”。

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由此变成不证自明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为后来大部分有关《青春之歌》的讨论预设了方向、奠定了基调。近年学界开始注意到林道静身份的多重性，例如林道静的女性身份：“林道静是被等同于‘知识分子’的，她的女性身份并没有作为问题而提出。”“重新打开《青春之歌》这一文本关于女性书写的内在历史视野，首先需要对指50—7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理论作出某种反省。”（贺桂梅）“可见的女

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林道静的“女性身份”在阅读阐释史中由最初的关注到如今的深度发掘，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伴随着林道静女性身份的重新发掘，我们也有必要意识到，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其实也颇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林道静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关此尽管仍有模糊之处，但家庭破产之后因家庭关系紧张而离家出走的林道静陷入衣食无着的困顿状态，林伯唐的实业家身份已成过眼烟云，林道静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身上仍流着“资产阶级的血”，这是她的原罪；但是她的出走表明她在精神上已不再属于过去曾经从属的那个阶级。这见证了她的觉醒与成长。

“资”与“小资”的身份问题之于林道静已不再成为问题。可是，另一个身份问题却更深深地困扰着林道静：她是“青年”无疑，但在“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时，她已是一个家庭主妇而不再是“学生”。辍学在家、高中尚未毕业的她能算“知识分子”吗？

《青春之歌》初版本篇末有这样的句子，“游行队伍中，开始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几万游行者当中，大中学生占了百分之九十九，其余是少数的教职员们。但是随着人群激昂的呼喊，随着雪片似的漫天飞舞的传单，随着刽子手们的大刀皮鞭的肆虐，这清一色的队伍渐渐变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兵士，不知在什么时候，也都陆续涌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来了。”从这段话可知，“大中学生”及“教职员们”构成了“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这是作家杨沫对“知识分子”的界定。这与今天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人们已不再视“大中学生”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实在当时，杨沫的这种界定也并非共识。否则《青春之歌》英译本在翻译这句话时，句中本应译成“intellectuals”的“知识分子”一词只是译成了“students”而已。因为在西方，“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与“students”（学生）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林道静的“阶级身份”是否包含有“知识分子”这一层面，这对于《青春之歌》的阅读、阐释及审美接受，都有着导向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不管林道静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青春之歌》都有理由、也有必要被纳入“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成长”这样的分析框架。但是，小说中的林道静并不是知识的传播者，相反，她是知识的接受者、崇拜者。她不但不是“知识分子”，相反倒是“知识分子”的追随者、迷恋者。小说中最像“知识分子”的余永泽在写给卢嘉川的信中，急欲讨论的不是“知识”，却是普通人应该具备的起码的“道德”。身为男性革命者的卢嘉川在宣扬“革命话语”时，这种“话语”的魅力迁移为革命者自身的男性魅力，吸引了已婚女性林道静的青

睐。在知识分子余永泽眼里，这样的“革命”显然触犯了“道德”。明眼的读者也发现了革命者的光辉角色并非没有裂痕，对此当时就有批判的声音。刘茵在《文艺报》上撰文指出，卢嘉川在宣扬革命真理时，与林道静发生的情感是“不道德”的。革命成了革命者吸引林道静的工具。小说中也借林道静之口如此说，“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道静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林道静对“大学生”甚至带着某种不明就里的盲目崇拜与仰慕。林道静在“大学生”与“知识分子”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卑微与景仰，间接表露着她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与差异。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尽管在好友王晓燕眼里，林道静“聪明、有头脑、又喜欢读书”，“比起一般知识和文学修养来，她都不如林道静”，但就林道静在《青春之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情感及知识水准而言，她还不足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实际上，林道静对“知识”的倾慕是相当深切、相当内在的。这种健康、朴素的情怀给人的印象更真实。余永泽与林道静初识，他们在海滨有过几天长谈，林道静觉得那虽不过是些“艺术、人生和社会的空泛议论，但是当这就要分别的一霎间，他们的心里却都感到了难言的依恋。”在这儿，知识体现为一种“空泛的议论”，它们的作用是为青年男女增加谈资，以驱除从前的“孤独困苦”。海涅的诗作可以让余永泽借以抒发爱意，他的吟咏像是“在低低地倾诉着自己的爱情”。当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感情由最初的“绚丽的虹彩”到“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林道静感慨的是“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已然消逝。这时的“知识”（学识，也包括小说与诗歌方面的知识）只是余永泽头顶的“光环”。

余永泽问林道静：“你一定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写过一本《隔绝》你读过没有？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可是我觉得你比她们还更勇敢、更坚决。”这番谈吐透露着余永泽的学养，林道静觉得他是一位“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知识”化作光环罩在余永泽身上，使林道静产生了爱的幻觉。然而知识究竟是什么？林道静似乎并没有细想。后来林道静与余永泽因志趣悬殊及道路迥异而分道扬镳，也不能因此而理解为林道静否定或者背离了“知识”，事实上林道静仍是“知识”的狂热追逐者，只是那些“知识”变换的内容而已。这就是《青春之歌》中由卢嘉川取代余永泽所进行的第二次知识传授，这一次知识传授的重点是马列著作及苏联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林道静的抉择之所以正确，并不因为她走近了“革命”、远离了“知识”，而是因为她的“知识”

更换了系统。小说中这样写道：“晚上，道静伏在桌上静静地读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做着笔记，加着圈点，疲倦的时候，她就拿起高尔基的《母亲》。她时时被那里面澎湃着的、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希望。”林道静从白莉萍、许宁那里借到许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有许多书她是看不懂的……可是青年人热烈的求知欲望和好高骛远的劲头，管它懂不懂，她还是如饥似渴地读下去。以至于许宁情不自禁地冲林道静慨叹道：“啊呀，小姐！你快要变成大腹便便的书虫子了！”林道静并没有因为倾向“革命”而鄙夷“知识”，但后来有关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言说史，却将“知识”与“革命”对立起来，甚至将“知识”与“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丑化。

“知识分子”要在“革命”中将自己改造成

彻头彻尾的工农大众，与他们水乳交融、形同一体，还是承认并彰显自己的“知识”优势，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事实上，在《青春之歌》中，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贴标语、喊口号、游行或者演讲，这固然是革命的一种表现及途径，但革命同样需要有深度的知识及理论的武装。在林道静的“成长”及后来的“觉醒”过程中，先是余永泽所代表的“五四知识”、“书斋知识”，继而是卢嘉川所传播的“革命知识”先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堪称这两种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共同源头，有关“革命”的“知识”与实践也一直是中国革命相辅相成的一体之两翼，但在后来的言说史中，产生与贮藏人类知识包括革命知识的“图书馆”却被反复丑化，走向“红楼大操场”成为惟一正确的道路。不知这是否符合卢嘉川、林道静的本意？或许，将青年学生的“求知”与“革命”对立起来，这并不是《青春之歌》的内在主题。至少在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一再重复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

丛刊2014年第6期目录

### 文学史研究

民主现代主义：再探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与欧洲小说之政治 ······

..... [法]魏简 著 潘律 译 魏简、李金佳 校

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激进化——试论姚文元的批评方法 ······ 陈晓明